

# 蔣公與黃埔

黃季陸

民國十三年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是極為重要

的一項心願。

國父對黃埔軍校的建立，是非常重視的。民

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國父特

會在廣州舉行，接著國父孫先生文在會中有系統的

親臨訓話，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吳鐵城和

我均有幸列席參加。國父在典禮中懇切的對學生

學校完成，這三件大事關係我國的革命建國實在

說：「今日為本校開學之日期，為何創辦此一學

校乎？蓋中國革命已歷十有三載，結果僅有民國

太大了。屈指算來，迄今已是經歷了一個甲子，

這六十年間的風雲際會，國運之由剝而復，可以

說莫不是由此衍進而來。關於黃埔軍官學校的建

立，早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革命同盟會

成立於東京之時，就已感到非有一支有主義、有

組織、有訓練的革命軍，不能使革命徹底成功，

以達到建國之目的；而真正革命軍之成立，非先

有忠於主義的軍事幹部之培養不可。此一願望在

國父心中可謂企盼已久。到民國十二年八月，國

父命先總統蔣公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

俄考察，同年十二月回國，在蔣公的考察報告中

，更明白的建議：「為求國家強盛，必先統一全

國；要統一全國，必先消滅軍閥；要消滅軍閥，

必先建立軍隊；要建立軍隊，必先建立軍校。」

這項建議當然深為國父所接納，而根據當時革命

形勢，這也是一項迫切的需要。所以在民國十三

年六月，黃埔軍官學校即應運而誕生。國父於他

的晚年親見黃埔軍校創建完成，也可算實現了他

的一項心願。

國父對黃埔軍校的建立，是非常重視的。民

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國父特

親臨訓話，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吳鐵城和

我均有幸列席參加。國父在典禮中懇切的對學生

說：「今日為本校開學之日期，為何創辦此一學

校乎？蓋中國革命已歷十有三載，結果僅有民國

之革命黨之志願。僅有革命黨之奮鬥而無革命軍之

奮鬥，革命遂難竟全功。故創校之希望，即為將

革命事業重新創造，以軍校學生作基礎，成立革

命軍也。諸生皆為未來革命軍之骨幹，挽救中國

危亡之大任，都在諸君之肩！」同年十一月十三

日，國父離粵啟程北上之時，途經黃埔，又特地

到軍校巡視，並校閱學生實施戰術演習，曾有所

感的對先總統蔣公說（時任軍校校長）：「余所

提倡之主義，冀能早日實行，今觀黃埔軍校學生

，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吾之革命

事業，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凡人

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

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

可以死矣！」可見國父對黃埔軍校學生期許之深

，已是將革命事業的重責大任放在軍校學生的肩

上了。由於國父對黃埔軍校的重視，所以對軍校

校長一職更是十分的慎重，他的心目中，原早已

屬意於先總統蔣公。在民國九年給蔣公的一封信

中，就已顯示了這項意見，他說：「自執信忽然

殞折，使我如折左右手，計吾黨中知軍事而肝膽

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

比，而知兵則又過之。」所以當決定校長人選時

，曾有人主張由國父自兼，而國父卻斷然說：「

我是國民黨的總理，學校是國民黨所辦的，自可

不必由我兼任。校長最適當的人選，仍以蔣介石

同志為最適當。」國父對蔣公信任之堅定，於此

可見一斑。

蔣公作事，態度嚴謹，重條理、重秩序，那

種臨事居於主動，處變若常的精神，令人十分敬

佩。猶憶我第一次看見蔣公，是在七十年前，即

民國四年的冬天，肇和兵艦起義之前不久，在上

海法租界寶昌路寶康里八號，是當時革命黨人的

秘密機關。那次我只能算是看見了他，並不能算

是認識了他，因為當時沒有機會和他交談。直到

民國六年的夏天，我才與蔣公有直接接觸。

那是正當北方督軍團鬧事的時候，國父命蔣公負

責經營江浙一帶的軍事，需要軍事的人才來幫助

。其時我剛完成復旦公學中學部的畢業考試，後

來曾任大元帥府秘書長的楊滄白先生，便要我北上到保定軍官學校活動一批在學的保定五、六兩期四川籍學生南下參加革命，供蔣先生的指揮和調度。這批青年軍人在辛亥四川保路之役時，都是陸軍小學的學生，其中大部份人不是和我聯繫過，便是對我都有好的印象，因為我是當時辛亥保路運動小學生同志會的會長。民國二年我由四川出外求學，他們因為請求要升學保定軍官學校，而被當時四川都督胡文瀾所不許，集體離川請願，正與我同路。返上海後，我領着七、八位少年軍官晉見蔣公時，他正在接見另一客人，我把同來的同志給蔣公介紹後，他似乎帶有警覺的態度，並認為我們應在住定之後，推出代表和他接洽。看他的神情似乎覺得我們辦事沒有條理，在秘密活動時期不應當那樣冒然似的。他這種重條理、操主動、臨危不懼、處變若常的精神，使我留下至為深刻的印象。蔣公的睿智，確有人所不能及的地方，譬如：民國七年他在廣東陳炯明軍中任職，一日陳炯明約他聚餐，座中有陳的部將葉舉，出言詆毀國父，他聽了，非常憤怒，當即離席，約陳到另一房間問道：「你是黨員，而你的部下可以當衆辱罵總理，你聽見了沒有？你為何不予以糾正？」陳炯明聽後，僅敷衍幾句，毫無誠意的表示。蔣公由是預斷陳炯明定會背叛國父，背叛革命；於是他便收拾行李離開了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部，而回到浙江奉化。其後他雖然迫於國父之命回到軍中，參預攻閩軍事，及此後由閩反攻廣東諸役。然而他對於陳炯明的為人，既早已見微知著，觀察深邃，他便時時都在戒懼

當中，不幸後來竟皆不出所料！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國父登永豐艦等待援軍；蔣公在滬聞訊，即決定冒險赴甯，表現出他對革命領袖患難相隨、赴義恐後的精神。由於此行生死難卜，因而在行前貽書張靜江，寄託後事。迄抵廣州登上永豐艦後，國父即昇以海上指揮全權，並對來訪的外國記者說：「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兩萬援軍。」永豐艦因處白鵝潭，食物漸缺，蔣公常冒險乘夜潛過叛軍封鎖線，採購食物，以事國父。國父察覺此事後對蔣公說：「我很感激你對我這樣做，但今後我不許你再冒險採購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幹部，我寧願失去整個廣東，也不能失去你，萬一我遭到不幸，今後革命大業是要你擔當的，你的責任太大了。」可見國父對蔣公倚重之殷切。國父說蔣公「知軍事而肝膽照人」實是一句很好的定評，而他的一生行事，也就是黃埔軍校學生最好的典範。試以他對陳英士先生的義舉而言，就是他的肝膽照人之處。民國五年五月，袁世凱收買刺客刺殺陳英士先生，英士先生被刺的地點是在上海法租界一位日本友人山田純一郎的家裏。當英士先生被刺之後，同志、親友大都驚惶失措，不敢露面；山田本人亦恐怕大禍及身，竟咆哮失態，前後如出兩人；惟獨蔣公挺身而出，把英士先生的屍體搬到自己的家中，而為之辦理喪事與善後。蔣公自撰祭英士先生的祭文，其文辭的哀痛，顯示他待人的篤厚與真摯。文中所流露出的感人真情，和他守約踐信，生死不渝的精神，可以說是最值得我們的崇敬和效法。這是人類生命中最最大的一項動力，

缺少這一動力，人類生命的光輝便要趨於暗淡了。當民國四年二月，英士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由日本赴上海主持國內革命運動，蔣公親送他到橫濱輪次，臨別時，他對英士先生說：「此去萬一不幸而為袁世凱所害，余當為兄之化身，以成兄未竟之志。」不料此後竟成讖語，蔣公也真正表現了他的踐諾精神。蔣公具備了這種承擔革命大業的品格，在當時自然是主持軍校的最佳人選，在他受命之先，雖然曾經謙辭，但當時輔佐國父的參謀總長李烈鈞先生也表示黃埔軍校校長一席非蔣公莫屬（見李烈鈞先生的自傳）。後來史實證明，蔣公真是不負國父的期許，他不但把黃埔一批又一批的學生，鍊成了國民革命軍的骨幹，他自己更是畢生服膺國父，為實現主義，忠愛國家，堅苦卓絕，歷劫不移。易實之際，尤殷殷以未竟志業期勉國人。六十年來，黃埔人才輩出，在東征、北伐、剿匪、抗戰、戡亂等歷次掃除革命障礙的戰役中，為堅持革命的主義，貫徹領袖的意志，他們有的壯烈成仁，有的建立功勳，寫下了黃埔的光榮歷史。

六十年後的今天，蔣公的偉大品格，不但為黃埔軍校的學生樹立了重創革命事業的典型，更為中國所有爭國家獨立自由、維護民族歷史文化的志士樹立了不朽的風範。今日的黃埔學生，不但有蔣公的風範，作為他們繼續革命志業的榜樣，更有歷屆前期學長的勳烈事蹟，作為他們奮鬥前進的標竿。革命的精神薪火相傳，未來的黃埔，必將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寫下更為璀璨光輝的史頁。